

【文学与艺术研究】

新世纪文学编年史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顾玲玲 李军辉

摘要:新世纪以来,实证性的文学史论著取代了阐释性的文学史论著,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撰写注入了新的活力。确切地说,这种实证性的文学史论著主要指编年史的著史方式。一般来说,文学编年史无意参与到“遮蔽”与“反遮蔽”的逻辑争论中,它们以一种工具性的自我定位,试图对整个文学史或特定视野下的文学史做出相对全面的勾勒。这种勾勒并非毫无意义的资料拼贴,而是让文学史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维度呈现其本来面貌,进而通过这种方式隐匿地传达出编者的文学史观念。文学编年史的著史方式追求一种客观精神和求实精神,同时也反映了文学史研究从“以论代史”到“以史代论”的思想嬗变。

关键词:文学编年史;实证主义;文学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11-0148-06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重写文学史”观念的影响,文学史论著如雨后春笋般问世。这些文学史著的叙述内容各具特色,叙述逻辑也各不相同。这些文学史著通过重写文学史开拓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传达出了各式各样的文学史观念。但与此同时,它们也在不知不觉中陷入“遮蔽”与“反遮蔽”的无限循环中。新世纪以来,“重写文学史”仍然盛行,但与此前不同,实证性的文学史论著取代了阐释性的文学史论著,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撰写注入了新的活力。确切地说,这种实证性的文学史论著主要指编年史的著史方式。

新世纪以来,随着文学史论著与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与成熟,学界出现了多部文学编年史。2006年6月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丛书”,其中有《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编年史:1900—2000》,但由于该书的编撰体例较为粗糙、内容较为简略,并未在学界引起多大反响。2006年10月,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任总主编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引发海内外学界的普遍关注,成为当时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领域少有的盛事。冯其庸先生认为,这部著作“无论从时间跨度上,还是从其历史意义来看,都可谓文学史界的万里长城”^①。这套编年史迅速成为研究对象,出版不到两年,陈文新教授便从众多研究论文中精选出26篇编成论文集《中国文学编年史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直至近年仍有不少论文屡屡提及这套编年史,甚至认为它“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编年史”,“其中於可训主持的现当代部分也是迄今最详尽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通史”。^②

在此之后,又相继出现多部文学编年史著作,如张健等主编的十卷本《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2012年);钱理群任总主编(钱理群、吴福辉与陈子善三人分别担任分卷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简称《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2013年);刘福春的《中国新诗编年史》(2013年);卓如、鲁湘元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2013年);张大明的《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2013年);陈亚平、王晓华主编的《新世纪后先锋文学编年史》(2013年);刘勇、李怡主编的

收稿日期:2021-06-10

作者简介:顾玲玲,女,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信阳 464000)。

李军辉,男,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信阳 464000)。

十一卷本《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2015—2017);欧阳友权、袁星洁主编的《中国网络文学编年史》(2015年);吴俊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2017年)等。这些编年史的写作时间跨度都很大,资料的收集与前期的调查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於可训先生参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前后耗时六年,钱理群等人主编的编年史耗时七年,张健等主编的编年史耗时五年,刘福春更直言《中国新诗编年史》的完成是他“三十余年的积累”^③。

新世纪以来,围绕文学编年史的主要论著,学术界展开了三次规模较大的笔谈活动。第一次笔谈的对象是陈文新教授担任总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以《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以及《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为主要平台,刊登了霍有明、陈平原、陈文新、鲁小俊等人的文章。第二次笔谈的对象是钱理群、吴福辉与陈子善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为主要平台,刊登了编者钱理群、吴福辉以及评论家陈平原、姜涛与王风等人的文章。第三次笔谈的对象则围绕刘福春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卓如与鲁湘元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以及张大明的《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而展开,以《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为主要平台,刊登了赵京华、刘福春、段美乔、萨支山与程凯等人的评论文章。

学术界对于文学编年史的实践以及观照耐人寻味,为什么近年来出现了众多文学编年史?不同的文学编年史作者对此有不同的答案。在於可训看来,采用编年史的体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重“论”轻“史”局面,它“迫使学者重新回到第一手资料中去,通过对文学史的原始资料的发掘、整理、钩沉、辑佚”,“构造一个‘用事实说话’的文学史的逻辑和秩序”。^④在钱理群等人看来,“‘编年史’的体例完全按照自然时间排序,就可以避免将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纳入某一观念,进行有序化处理所带来的弊端”^⑤。在刘勇看来,“因为文学编年史的编写是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的,但它又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而是在其中有一个明显的意图存在”,“这种意图就是要让人看到文学发展的时间的意义、细节的价值和逻辑的力量”。^⑥

在笔者看来,新世纪以来出现的“文学编年史”书写热潮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反映了文学研究范式从“重阐释”到“重实证”的转变。在“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史著中,阐释文学作品与时代之间的紧密关联是其核心要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写文学史”观念下书写的文学史著中,阐释曾经被遮蔽的主题和技巧是其重要内容。从根本上说,这些文学史著都是特定观念指导下的产物,“文学编年史”试图对这种写作范式进行反拨,它旨在通过呈现文学史实的方式来探寻文学发展的实质,它的价值与意义呈现在多个层面。具体来看,文学编年史具有无法摆脱的工具性,富有创造性的学者在工具性的基础之上使之向思想性维度延伸,从而在文学编年史写作内部与文学编年史写作外部形成了两种差异性。

一、呈现史实与启发后学

编年体起源于远古人类的结绳记事,是中国古代史书典籍中最为古老的著述体例之一。东汉郑玄《周易注》中对远古人类结绳记事的具体方法解释为“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我们姑且不论结绳记事科学与否,郑玄的解读正确与否,仅通过“结绳记事”的字面意思,即可得知远古人类试图通过“结绳”的线性形式来实现“记事”的目的。

《左传》作为我国现存较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具有无可替代的史学价值,它涉及“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农业、文化、典制、名物、世系、伦理、礼俗、天文、历法、地理以及西周的社会状况、远古传说等方面”^⑦。据学者考证,“大约在《左传》成书之后不久,鲁国的编年体国史《春秋》也开始成为孔门后学的讲习课程之一”,但因为“《春秋》叙事过于简略,且史官记事自有其历代相传的一套体例书法,故一般人不易理解”,而“《左传》内容丰富,叙事详实,经师们就用它来解释《春秋》中的史事,犹如今日之‘辅助材料’”,但由于“最初的《左传》”“题材是纪事体,查找起来很不方便”,“以后经师们就索性按照《春秋》的体裁,将《左传》改编为按年编排的编年体”。^⑧此后的《资治通鉴》等编年体史书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同样也有一种“辅助材料”的功能。由此可见,编年体有着与生俱来的工具性。

时间与空间维度的探索是文学史写作的目标之

一,它们分别与历时性和共时性互为关照。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角度看,编年史的工具性都有所体现。纪传体史学论著多呈现出“以点代面”的时空意识;编年史则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陈文新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除采取编年史固有的“向下的时间序列”外,另外采取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因而它既“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同时也“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⑨与这种安排相对应的,是张健主编的十卷本《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这本编年史在“向下的时间序列”上进一步拓展,在某些史实的记载上甚至细化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其实,这种时间序列的创新不仅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一般编年史的不足,而且也进一步将其工具性推向极致。除此之外,文学编年史在共时维度上的全面叙述也是其工具性的体现。

文学编年史之外的很多文学史写作主要采取的是“以论带史”的著史方式,它们醉心于个体论点的阐释,而无意于探究某年某月某日的文学现场事实上到底如何。这些文学史书写所忽视的,正是文学编年史的优势所在。谈及借助编年史体例著史,於可训曾说,他试图“重新搜集、发掘、整理为此前的现当代文学史所遗漏或舍弃的重要史料和史实,以便为构造新的更完备的现当代文学史”^⑩。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文学编年史以时间先后顺序同时收入“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艺争鸣、社团流派、文学交往、文学会议、作家生平、作品发表、理论批评、文学报刊沿革、文化和文学政策的制定与沿革”^⑪。

张健在《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的“总序”中认为,文学编年史展现的是一种“静默的呈现”,“编年史的时间力量,不仅在于历史纵向渐进过程的显示,而且更多地表现在共时态的叙述上”,“‘某年’、‘某年的某月’、‘某年某月的某日’等,不仅仅是同一、均质的时间能指,琐碎散乱的史实共时态地铺在了这些时间段里,而且还形成了一个文学时代的多维空间,它使‘复现’历史语境成为可能”,“这种共时态与历时态相互交织的、琐碎散乱的‘堆积’,正是编年史特殊的历史叙事方式”,是一种“静默的呈现”。^⑫这种“静默的呈现”是对文学编年史工具性叙述方式的巧妙概括。

与阐释性的文学史著相比,优秀的文学编年史

总是以准确地呈现史实为主要目的。这种呈现史实的方式既是著史者实证主义精神的表达,也是文学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保证。事实上,除了最基本的呈现史实的功能之外,文学编年史还承担着重要的启迪后学的作用。编写者们试图通过文学编年史的写作为下一代文学研究者提供思考的源泉,这在钱理群等人的编年史写作中体现最为明显。

钱理群主编的编年史预期读者是“已经初步具有相关文学史知识的青年学生、研究生、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⑬,他希望这其中“有心的读者”能够洞察到书中“写而不点破”的“内在线索”,从而为“读者留下想象与思考的空间”。^⑭吴福辉也说,他希望自己编撰的编年史能够成为“未来的读者自己‘重读’文学史,不断‘文学史’”^⑮的源泉。陈平原则称钱理群担任总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既是“一代学者的谢幕之作”,又是上下两代学者“代际交接的接力棒”。在他看来,“‘接力棒’是指编写者吸纳新一代的目光,将导致这套书的内部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说不定此乃日后学术发展的关键,或曰‘生长点’”。^⑯后来的情况也正像他们期待的那样,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从中感悟到了更为深层的想象空间。这种文学想象空间的背后,饱含着上一代学术大家们的殷切期望。

二、实证主义精神的张扬

毋庸讳言,任何一部文学史的写作都体现着著史者的史学思考。就当代文学史写作领域而言,当唐弢、施蛰存等人宣扬的“当代文学不宜入史”的论调仍在耳边回响时,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却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王庆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董健与丁帆等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以及孟繁华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共同响应了“重写文学史”的号召,使得当代文学史写作成功地进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新世纪文学编年史的探索既可以说是“重写文学史”延续的一个侧面,又可以说是在为更多的“重写”运动做足准备,当下的文学编年史大都有着相似的史学追求。

文学编年史的编写者们都期望能够真实地还原文学现场,这种编写方式本身并不热衷于“遮蔽”与

“反遮蔽”的论争,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反遮蔽”的作用。阐释型的文学史著需要通过论证来证明它们的观点,文学史实对于它们来说,是一堆等待筛选的材料。合则用、不合则弃,是这类研究范式处理材料的基本方式。换言之,阐释型文学史著对文学史原本面目的反映是经过细致雕琢过的,它无法反映文学史的本真面貌。文学编年史则旨在尽可能全面地呈现文学史,它超脱了阐释型文学史著之间的那种“遮蔽”与“反遮蔽”,它反对一切“遮蔽”历史的行为,希望实现一种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反遮蔽”。

不少编年史家都曾强调过他们对史实的渴求。於可训在谈到编撰编年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时指出:“所录入的文学史实,涉及事实经过部分,或综合各种材料进行简明扼要的叙述,或摘引某一完整的材料代替叙述者的综合,皆力求真实准确。涉及对事实的评论部分,则征引原始文献,复现当时人的观点。涉及对立或不同意见,则征引多家评论,以便比较。”^①由此可见,於可训试图通过尽可能全面地编排文学史实的方式来复现文学现场,这使得文学史的历史线条更加清晰明了。钱理群也坦言,“‘进入历史情境’与‘现场感’,都只是相对的,有限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历史既不可重复,也就不可能重新进入”,但他“依然认为,努力去接近,还是有可能的,而且有没有这样的努力,效果是不一样的”。^②透过他的编年史写作,我们确实也能够感知到这种努力。张健则说,他的编年史“作为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大型编年史,勉力勾画的是一幅眉目清秀、行貌完整的当代文学的‘清明上河图’”^③。张大明饶有深意地在其编年史的“开篇说明”中写道:“文学史研究对史料的掌握要做到‘竭泽而渔’”^④，“竭泽而渔”确实也成为众多编年史写作者的著史追求。这些勤勉的研究者通过多年的资料收集与编撰所想要实现的就是能够“还原文学现场”,即便这种“还原”只能是无限地趋近、无法完整地重现。

同时,文学编年史的写作试图摆脱“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中重“论”轻“史”的文学观念,力图建构一种“以史代论”或“论从史出”的文学史方法论。於可训反思了先验成分十足的方法论,他认为“‘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方法论,无疑带有很重的先验成分”^⑤,在这种先验成分的诱导下,很多作品会被误读。在他看来,学者需要“重新回到第

一手资料中去”,“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这些文学史料的甄别与选择、比照与胪列,构造一个‘用事实说话’的文学史的逻辑与秩序。这种文学史的逻辑和秩序,不是靠观点来‘黏合’史料,而是靠史实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的,史家的观点和评价,就隐含在这些史实及其所建立的关系之中”。^⑥钱理群也表达过相似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全书条目的选择与叙述,都暗含着我们对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些基本关系的持续关注,如文学与时代政治、社会、经济问题的关系,文学与出版、教育、学术……的发展,等等,都形成了我们的历史叙述中的内在线索,看似散漫无序,时断时续,但有心的读者是不难看出其间的蛛丝马迹的。”^⑦刘勇与李怡也直接阐明:“文学编年史本身,当然也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它的判断不能直接表现为文学现象的筛选,当然更不能转化成一一系列明确的论述,编年史的存在形态就是以时间为单位,将某一时间段发生的文学事件、产生的文学作品客观呈现出来”^⑧。以上类似的观点我们同样可以在张健、刘福春等编年史研究者的论著中清晰可见。由此可见,为了摆脱现有文学史研究思维定势存在的弊端,文学史家们试图通过编年史的方式,实现“以史代论”的实证叙述方式,这极大地张扬了文学研究的实证主义精神。

三、文学史的多面呈现

不同形态的文学史写作之间既存在某种共性,也存在着各具特色的差异性。恰如前文所提及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不同文学史家基于不同的史学素养与价值追求创作了各具特色的文学史著作。在这里,笔者所谈的文学编年史的“差异性”内涵较为广泛,既指它与文学编年史以外的文学史之间的差异性,同时也指文学编年史写作内部所存在的差异性。与文学编年史之外的其他文学史书写相比,文学编年史在体例与方法论上与它们的差异十分显著,前文不同部分已有所论述,兹不赘述。在文学编年史之内,除著史对象存在差异外,不同的编年史在内容选取上的差异也较为明显,同时,文学编年史在著史意义的定位上也有一定不同。这里主要侧重论述文学编年史内部的差异性。

首先,不同文学编年史的著史对象有所差异,这种文本间的差异性使得彼此之间得以互补。

文学编年史中既有宏观叙述整个“中国现代文

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著作,更有着眼于“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现代文学编年史”“左翼文学”“新诗”“网络文学”“民族文学”以及“先锋文学”等专门的文学编年史著作。这些编年史著作汇聚在一起,可以更加全面地展示文学发展的不同面貌,从多个角度呈现学者们的研究成果。

文学史的写作从来都是需要想象力与创造力的,2009年吴福辉的《插画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摆脱了曾经呆板僵化、毫无生气的文学史写作模式,以个性化叙述的方式实现了对主流文学史的消解或补充;2010年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则体现了他“坚持从史料出发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与学风;多元共生的文学史观和方法论;继承、坚守‘五四’,又超越‘五四’的基本立场”^⑤。在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时,钱理群曾谈到出版背景与考虑,他认为以往的文学史著作“陈陈相因,重复劳动的多,真正有独创性的著作”却较少,因而认为“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当下状态却不能不令人忧虑:表面的繁荣下面,掩盖着实质上的平庸”。^⑥众多编年史著作确实也试图去突破这种平庸,《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中收入了大量的文言小说以及古体诗,而这些文本在“新文学”或“现代文学”的逻辑架构中是被排除在外的,卓如、鲁湘元试图以补充与发掘史料的形式来凸显出自身编年史的差异性。张大明的《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与其他编年史的不同点在于,它具有较为鲜明的个人风格,是一部有立场的编年史。它通过“本篇要略”和“本篇结语”等形式,使得史实在具有工具性的同时能够成为支撑作者立场的有利论据。除此之外,《中国网络文学编年史》通过对汉语网络文学的梳理,向我们展现了网络文学的线性发展。尽管这部网络文学编年史的编撰在内容和体例上都显得较为粗糙,但它毕竟向我们展示了粗线条的网络文学发展史。

其次,尽管所有的现当代文学编年史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历史”,但在不同审美标准、不同价值体系指导下书写的文学编年史在内容的选择上、线条的描摹上都有所差异。

在现代文学编年史的写作上,我们通过对於可训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与刘勇、李怡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1895—1949)》做比

较可以粗略发现:从时间跨度上来看,前者从1912起至1949年止,后者则从1895年起至1949年止;从篇幅上来看,前者共1卷80万字左右,后者共11卷280万字左右;从内容上看,两书所收录的主要内容差异不大,主要差异在于由于篇幅不同所造成的史料数量上的差异。

文学史的起点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新问题,於书并未明确表明将1912年设为现代文学编年史起点的原因,但“绪论”中谈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期”时,他指出:《中国新文学史稿》中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是1919年,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分期一致;《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是1917年,与《新青年》迁京有关;《新文学史纲》中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为1918年,是新民主主义文学的分期方法;《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是1917年,并将第一个时期命名为五四运动时期。^⑦由此可见,於书将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的起点设为1912年是综合考量新文学运动的结果。刘勇、李怡主编的现代文学编年史对这一问题则有明确说明:“清末民初的文学,实乃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正是其文学与文化的不断新变,引领了后来五四文学革命的爆发,也直接启蒙了现代文学的发生”^⑧,颇有点儿“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逻辑意味。

於书所录入的文学史实主要包括“文学思潮、理论批评、创作现象、社团流派、文学交往、文学会议、作家生平行止、作品发表出版和文学报刊的沿革变迁,以及与文学有关的重要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文化活动等背景材料”^⑨;刘勇、李怡主编的现代文学编年史的内容主要包括“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作家行踪、文学活动、文学思潮、文学出版、主要文学作品的基本情况”^⑩。虽然於书篇幅有限,但竭力描摹了尽量多的重要文学史实,刘勇、李怡主编的现代文学编年史则在於书基础上使史实更加翔实。在当代文学编年史的写作上,於可训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与同为北京师范大学主要编纂的《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有类似的异同点。

最后,著史对象的不同、内容选取上的差异,是由文学编年史不同的定位决定的。

刘福春在谈及自己的《中国新诗编年史》时坦言,他希望努力将这本书做成一本“信史”^⑪。钱理

群的编年史在“总序”中明确表明他是有预期读者的,而且他特别强调“我们不承担普及、传授文学史知识的任务”^②,经由吴福辉等人的进一步阐释可以得知,他不希望通过文学编年史的方式去传授固化的知识,而是希望后进学者能够在该书的启发下创造出更具想象力的文学史书写。与此不同的是,於可训在谈及他的文学编年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时,则认为编年史既有“史料学”和“文学史学”方面的价值,也有“文学史教学方面的价值”,他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成为“文学史学习的辅助材料”。^③如果说钱理群等人的文学编年史编撰只是以个性化的方式启发部分已有文学基础的人群的话,那么於可训等人所编写的文学编年史则上升到更为宏观的高度,并使文学史具有了开拓性的社会意义。

不同的文学编年史书写者在编写之初应该有着不同的定位,他们或是希望自己的著作能够启发后进学者,或是希望能够拥有教学价值,或是希望认真书写一部完整“去蔽”的“信史”。这些定位与文学编年史的差异性内容和编撰策略,共同呈现了文学史的多重面相。不同文学编年史的差异与特色都体现了文学史家试图还原文学史现场的努力。

注释

①转引自崔清新:《系统完整涵盖古今——中国文学编年史问世》,

《光明日报》2006年11月12日。②刘勇、李怡:《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构想》,《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③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541页。④⑩⑪⑬⑭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於可训:《〈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的理论与实践》,陈国恩、王德威、方长安主编:《“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反思与重构”国际高端学术论坛论文集》,2014年,第168页。⑤⑬⑭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总序”第3、3—4、3—4、3—4、3—4页。⑥刘勇:《关于文学编年史现象的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7期。⑦胡安顺:《简论〈左传〉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华夏文化论坛》2015年第2期。⑧王和:《〈左传〉的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4期。⑨陈文新:《〈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主旨及特点》,《文艺研究》2006年第9期。⑩⑱张健:《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9、8页。⑮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的写作和我的文学史观》,《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⑯陈平原:《代际交接的接力棒》,《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⑰钱理群:《我的文学史研究情结、理论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书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0期。⑲张大明:《中国左翼文学编年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页。㉑钱理群:《“守正出新”——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当下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9期。㉒於可训:《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1页。㉓⑳刘勇、李怡:《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1895—1949)》第一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第5页。㉔刘福春:《还原历史的丰富与复杂》,《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

责任编辑:采薇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Writing Literary Chronicles in the New Century

Gu Lingling Li Junhui

Abstract: Since the new century, empirical literary history works have replaced explanatory literary history works and injected new vitality into the writing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To be exact, this kind of empirical literary history mainly refers to the way of writing chronicles. Generally speaking, literary chronicles have no intention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logical debate between "covering" and "anti-covering", and they try to make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outline of the whole literary history or the literary history in a specific field of vision by means of instrumental self-positioning. This kind of sketch is not a meaningless collage of materials, but makes the dimension of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literature history show its original appearance, and then secretly conveys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history in this way. The way of writing literary chronicles pursues an objective spirit and realistic spirit, and at the same time reflects the ideological evolu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research from "criticism substitutes for history" to "history substitutes for criticism".

Key words: chronicle of literature; positivism; history of literature